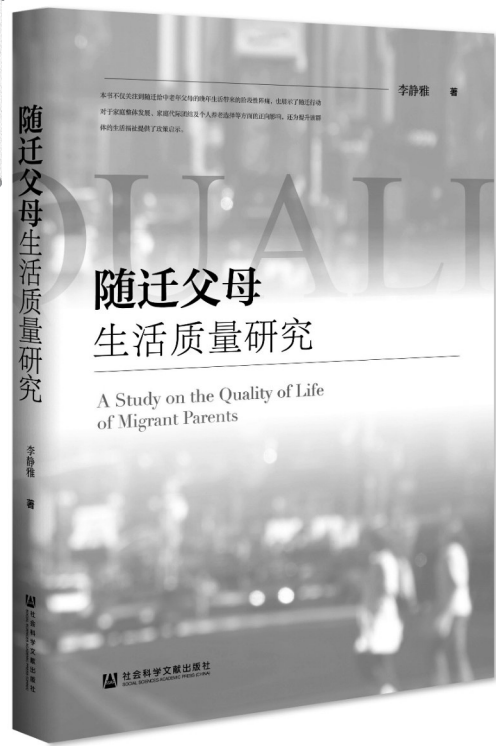


专家视点

随迁会给父母的生活质量带来什么

《随迁父母生活质量研究》以照料孙代型随迁父母辈为研究对象，围绕该群体的迁移特征、身心健康、社会交往和夫妻分居现象、家庭代际关系、留居养老意愿等议题开展全方位研究。书中不仅关注到了随迁给中老年长者的晚年生活带来的阶段性阵痛，也看到了随迁对其养老选择带来的更多空间和可能性。

李静雅

随迁父母
生活质量研究A Study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Migrant Parents

李静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就很清晰地奠定了有别于以往文献的属于自己研究的新起点。

其次，根据被研究问题的内在逻辑关系，把学术研究做开做细，所形成的成果也随之变得更加有深度和内涵。尤其是沿着从行为表现到主观体验再到观念态度这样一条路线层层递进，再加上定性分析和定量建模检验的有机结合，使得每一个问题的研究既有细化的描述分析，又有分性别的比较观察，还有建立在多元回归基础上的影响因素估计，进而赋予这本书有别于过往研究的学术价值。如关于随迁父母在流入地的社会交往和参与、隔代照料观念、孙辈照料意愿和照料主观感受、父母双双随迁、一方随迁的不同迁徙方式和家庭代际关系的性质与质量等，不管是单个概念的深入理解，还是概念之间内在联系的挖掘分析，都很有新意和富有启发价值。

第三，对策分析拉近了两种关系：一是与前人对策相衔接；二是与本研究原因分析结果相对应，使得对策思考有依据、有针对性和可行性，从治本角度提出综合治理的思路和措施。如“积极看待随迁父母照料孙辈现象的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为随迁父母的婴幼儿照料工作‘减负’，保护其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等，都强调在加快老龄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老年人口自我养老和服务家庭与社会的作用。还有关于“引入‘家庭思维’，加大‘以家庭为本’理念下的政策探索”的公共政策设计建议，更是有利于把随迁父母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举全家之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相信作者的抛砖引玉之作，一定会引起学术界、政府和社会的更多关注，在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下，减轻父母辈的隔代照料负担，强化子女辈的反哺赡养功能，促进原生家庭与自建家庭的顺利对接和彼此照顾，也一定会增加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作者为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兼职教授）

久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涉及如何把文化传统发扬光大去指导现代生活实践，去优化宏观社会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方向。在与家庭持续发展并行之中，代际关系一直是东西方社会关注的重点，我国依然保持“反哺式”的互助，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尊老爱幼、母慈子孝的父母辈尽责、子代尽孝的家庭相亲和互助依然是中国人代际关系的主旋律。但是作者也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近距离地发现：“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加之代际寿命延长以及子女数量减少，传统社会中父母辈抚育子代并完成分家后就可以享受子代赡养的反哺阶段被不断推延，转型社会中的家庭代际关系更多以父母辈任务无限绵延，责任边界不断被突破为特征。”这种在“抚育”和“赡养”之间所形成的传统平衡被打破后，不仅影响到父母辈的生活质量和晚年幸福，而且还会改变人们对生育价值的传统理解，把原来只是暂时的政策性减少生育变成基于利益权衡的理性少生甚至不生，维持家庭生生不息的代际关系也就在文化上断层了。

作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视角的研究，深化了对随迁现象已有的一般性人口学研究，强化了社会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情怀厚度，特别是从当前更多地注重婴幼儿照料问题的“向下”研究，转化到向上向上一起兼顾，也关照步入老龄的父母辈生活质量和日常照顾的问题，加重了这本专著的文化分量。显然，如果不是在家庭文化建设上提高认知，从全社会文明进步的角度理解和担当“抚育”和“赡养”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一种以爱和感恩支撑的家庭行为准则和文化自觉，为健康互惠的代际关系构建一个友好型支持型的社会，那么当父母辈在利益互换中随着年龄加大越失去可以利用的资源价值时，他们的赡养照顾就越会成为一个个家庭外部的社会负担，而生育的“赡养”功能弱化和替代，家庭家族的传承、人口可持续发展确实就会面临新的挑战。

有深度：把学术研究做开做细

最后，这更是一部有深度的专著，因为作者在赅述社会科学早已蔚然成风的研究规范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学术创新，深化甚至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首先，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评价做得很认真很深入，实现了既站在研究最前沿，又立足学术最高处的课题研究目标。例如，关于“已有研究在看待中老年人照料孙代行为时，大多是将隔代照料作为既定事实，考察其对于中老年人身心健康、养老预期、女性劳动参与以及孙辈成长的利弊影响，而中老年人作为代际支持提供者的主体心境和感恩意愿往往被习惯性忽视，也并未发展出针对中老年人参与孙代照料之观念态度和现实感受的量化指标及其系统研究”的学术评价，

研究视窗

《“大思政课”视域下推进课程思政培育时代新人探究》

作者：赵崔莉 陈力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要坚定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要坚持知识技术与家国情怀、使命担当、价值规范相统筹；要构建课程思政育人新格局，坚持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结合。“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在“课程”，主力军是教师，抓手是“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灵魂是打造“真善美”的课堂。本文作者认为，高校课程思政培育时代新人需要从

《性别视角还是性别滤镜：博士生压力问题的反思》

作者：王卉

已有基于性别视角的博士生压力研究，主要依据女性主义理论来探讨女博士生面临的诸多压力，甚至将女博士生面临的所有压力均称为“性别压力”，而男博士生的压力则较少问津。但是访谈发现，科研压力和就业压力作为博士生最主要的压力，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女重于男”“主要影响女性”的倾向。性别压力在博士生中表现为女

性的婚育压力和男性的经济压力，映现出男女各自的社会角色特点。男博士生面临的压力并不为人们关注或承认。本文作者认为，我们有必要摒弃“性别滤镜”的立场，客观、公正地看待男博士生和女博士生的压力。

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白晨 整理）

■ 叶文振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资源流动的基层组织。在每一个家庭内部，可支配的资源存量，如时间、精神、知识、财富等，既在代际之间上下流动，又在夫妻之间横向交流。从生育支持新政落地、刺激生育意愿回升来看，家庭资源的代际向下、两性向女的流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所以我们大力提倡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引入到婚姻家庭生活过程，继续鼓励传统反哺家文化中父母辈对子女辈生育养育的责任和他们自建家庭的支持。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较少去关注代际间家庭资源向下流动的现状、特征，以及会给年迈父母辈的生活质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如果这种影响超过父母辈所能接受的水平，那么家庭资源向下流动还能持续多久？

可喜的是厦门大学李静雅博士在其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青年项目中，把跟随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帮助他们带孩子的父母作为研究对象，集中探讨“生育新政背景下随迁父母的生活质量”。

有温度：立足生活才能服务于生活

这是一部有温度的学术专著，因为它是和作者扮演多重社会角色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交错在一起，既成稿于对人间烟火的观察和思考中，又借接地气烟火把蕴藏在字里行间的家庭生活热情与希冀燃烧起来。作者告诉我们：“自2018年本课题立项至今，我再次经历了怀孕和生育的过程，本以为帮我带完大宝上小小学后便可轻松下来的父母辈们，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帮我照料二宝的忙碌之中。母亲把身体不好的父亲托管在养老机构，继续住在我家中一边帮我带孩子，一边定期前往养老机构陪伴父亲。”“这些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育儿之难和养老之忧，集中折射出中国家庭所面临的代际功能弱化、社会化服务资源供给不足、家庭支持福利缺失等多重考验，足以体现抚育和赡养之于家庭幸福而言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完善‘一老一小’家庭支持政策体系的迫切性。”

什么是课题急难愁盼的问题？社会科学家申请到课题研究资助，也下到基层、走进家庭，但不亲身经历或者长时间的嵌入生活，能做到感同身受吗？作者的研究经历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所谓研究者的价值中立，只是不能去猜测，甚至臆断被调查对象发自肺腑的心声，而我们的社会责任却不能淡漠，要让我们的研究充满对百姓的牵挂、表达真正的情感，就要像如同解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困难一样，借助国家资助的课题研究去及时有效地帮助百姓解困。“学术研究是有温度的，其来源于生活才能高于生活，立足生活才能服务于生活。”

有厚度：从传统家文化视角研究

这还是一部有厚度的专著，因为它涉及历经

作者：任远 金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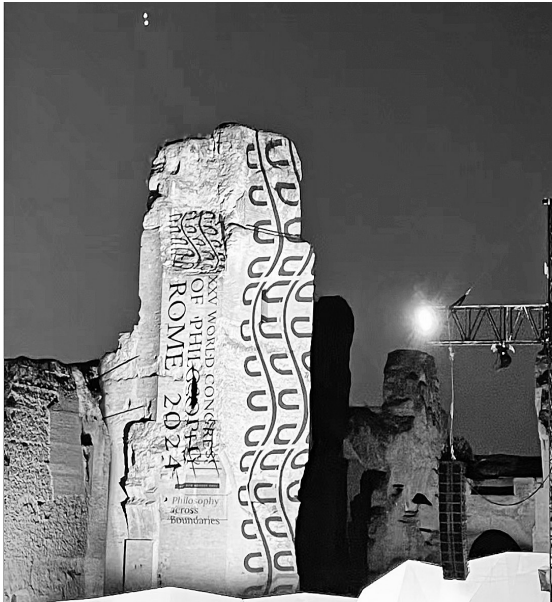
通过分析家庭因素对居民期望生育数量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性别、不同户籍和不同地区人口群体之间的差异，发现如下：(1)加班和长时间的工作没有抑制居民的生育意愿，那些长时间工作的劳动者甚至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加班主要对“多孩生育”期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男性群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2)夫妻之间更高质量的婚姻关系和长辈提供家务支持有利于提高夫妇的生育意愿。(3)夫妻共同居住会对女性生育意愿具有积极影响。具有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对于“多孩生育”期望具有抑制作用，“偏好男女双全”对不同群体均表现出提高生育意愿的作用。(4)家庭经济收入越高，人们“生育孩子”的期望和“多孩生育”的期望都更高。基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家庭变化，需要通过综合的家庭政策支持人们的生育；同时，完善家庭政策应该考虑中国具体国情特点和不同人口群体的具体需求。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家庭因素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及政策启示》

8月，第二十五届世界哲学大会在意大利罗马举办，会议主题为“跨越边界的哲学”，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学者参会。“跨越边界的哲学”意味着跨越国家、跨越政治的边界，意味着跨越学科的边界，意味着跨越时空的哲学。“国际女哲学家学会”也以“学术中的女性”为题组织圆桌论坛等活动，来自不同国家的女学者一起畅谈自己的学术经历和体验，回顾历史、立足现实，共同展望女性在哲学领域的发展，共创全球女性发展的未来。

阅读提示



第二十五届世界哲学大会在意大利罗马举办。

■ 肖巍 文/摄

2024年8月，第二十五届世界哲学大会在意大利罗马举办，会议主题为“跨越边界的哲学”，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学者参会。FISP（国际哲学联合会）主席，本次大会主席卢卡·玛丽亚·斯卡兰蒂诺在开幕式演讲中指出，哲学思考在当今世界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尤其在全球化挑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哲学家应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科技进步中的伦理挑战、社会不公正等全球性问题的责任，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合作，通过跨文化对话推动全球哲学界的合作与创新。依据笔者的理解，“跨越边界的哲学”有几种含义。

跨越国家、跨越政治的边界

首先，“跨越边界的哲学”意味着跨越国家、跨越政治的边界。斯卡兰蒂诺强调，这是一个向全世界所有地区、所有信仰、所有性别、宗教、语言和国籍学者开放的论坛。各国学者被召唤承担一个使命：跨越政治边界进行永久性学术交流，建立广泛的学术联系网络，促进不同文化之间和人类文明本身具有的相互渗透功能，并联手应对全球范围内并发的各种军事、经济、政治、技术、环境和文化危机。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社会动荡和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正在打破关键的社会纽带，包括公众信任，以及为人所熟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哲学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诸多的现实问题。为此，大会设有不同的论坛，各国学者联袂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议题。尽管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哲学家都在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做”哲学，然而要理解世界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复杂性，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需要一种跨文化的转向，因为在单一文化视野内已经无法解读当代哲学。在全球化时代，思想、语言、习惯、信息和风格都处于不断融合之中，以单一文化、自身文化视角进行思考已经不再有效，人类社会需要一套更具包容性的哲学概念来解开当今时代的复杂逻辑，理解其历史根源，以便共同迎接当今世界发展中的各种时代挑战。

跨越学科边界

其次，“跨越边界的哲学”也意味着跨越学科的边界。斯卡兰蒂诺也提醒人们注意到哲学本身的范围绝非是僵化的，而且我们正面临一个重新评估哲学作为一个独特学科的意义、范围和界限的历史机遇。事实上，当今世界的科技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已经对人的本质、社会关系，以及伦理规范和秩序形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需要哲学在跨学科、多学科中发展。在“人工智能与人的自主性”论坛上，意大利女学者西蒙娜·蒂里贝利探讨了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关系自主性问题，指出人工智能伦理框架促使人类意识到，有必要以自主性原则协调应用人工智能带来的伤害，这些伤害会对边缘群体和受压迫者产生巨大影响。但在她看来，在现有的人工智能伦理中，自主性体现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观念，不仅在许多方面没有看到由于违背人的自主性带来的伤害，而且助长了与殖民化遗产相关的风险，并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对边缘群体和脆弱群体产生负面影响。为此，她阐释了一种非西方化的“关系自主性原则”，把关系自主性视为一个伞状概念，认为自主性是对解放和自由的追求，并聚焦于自主性实现的社会条件，指出建构自主性不仅需要理性，也需要人的关系性，而这种关系性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和团结为前提条件的。

跨越时空的哲学

再次，“跨越边界的哲学”意味着跨越时空的哲学。哲学进步需要在历史、现在和未来进行探索。德国学者苏珊·勒托基基于黑格尔的家庭观探讨性别、种族与财产的关系，以及家庭、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联，以女性主义哲学思维批判性拓展哲学传统，使其更具包容性地成为思考和解决当代问题的理论工具。与会中国学者也提出把中国的关系主义世界图像延伸到早期中国的关系伦理学上，并聚焦于孔子的互惠伦理学和老子的柔性伦理学，强调这两种伦理学都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和相互对待为出发点，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和良好生活为根本目标。这种关系主义伦理思维是当代世界和平、繁荣和发展的价值基础。

最后，“跨越边界的哲学”也意味着哲学发展需要打破和跨越自我的边界。哲学进步需要人们不断地重新评估自己的信仰和认识模式，而开放自我的疆界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如果说哲学的功能在于拓展思维的可能性空间，那么伦理学的意义便在于培养更具包容性、开放性的自我。这便意味着自我需要随着文明和时代的发展不停地转化，通过理性、关怀和移情理解和接纳那些与我们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历史境遇、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人们，让他们融入我们的世界，超越“小我”的一己私利，扩展自身对于现实的理解和体验，学习如何通过邻居的眼睛看待世界，培养自我博大的胸襟，以及理解他人及其需求的敏感性。与会学者也从不同学科视角探讨如何超越自我的边界，与他人达成共识的问题。例如来自爱尔兰柏林大学的女哲学家梅林·帕帕吉安围绕一系列提问探讨了这一问题——移情是基于感知、内在能力还是一种理论？移情是否作为一种特有的认知、情感或者体验过程？移情对于道德直觉、判断和行为是否是必要的？是否人们只能移情于自己认识的人，还是也能够移情于遥远的、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们？移情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区分移情与其他类似概念，诸如同情与共情概念？

“学术中的女性”

在“女性主义哲学论坛”上，奥地利学者瓦尔特·恩斯特特指出，现代欧洲科学自伊始便痴迷于通过阐述分化、歧视和等级划分把人地区区分开来，尤其是在性别、阶级和种族等方面。尽管在20世纪已经受到来自妇女解放运动、非殖民化运动和科技进步的挑战，但这些区分仍在发挥作用。因而，我们需要探索一种理解人类复杂关系的模型，以溶解一些具有压迫性的区分，消除支撑它们的概念力量。笔者也以《以关怀伦理路径构建全球健康共同体》为题发言，回顾休谟的道德情感主义传统，阐释当代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如何修正这一传统强调道德的关系性、情境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共生性，把儒家的“关爱”与女性主义“关怀”相比较，得出中西方伦理学都具有尊重生命、关怀和关爱他人、注重群体生命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恰好是构建全球健康共同体的伦理支撑和路径。“国际女哲学家学会”也以“学术中的女性”为题组织圆桌论坛等活动，来自不同国家的女学者一起畅谈自己的学术经历和体验，回顾历史、立足现实，共同展望女性在哲学领域的发展，共创全球女性发展的未来。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话「跨越边界的哲学」——聚焦第二十五届世界哲学大会
共创全球女性的未来